

毛泽东在延安



毛泽东在延安

——一个确立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组织人
——理论宣传与文艺活动的水手



A755

11

微观党史①

毛泽东在延安

——关于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组织人
事、理论宣传和外交统战活动实录

张希贤、王宪明、张伟良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北京

(京)新登字(167)号

毛泽东在延安

关于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
组织人事、理论宣传和外交统战活动实录

*

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绒线胡同贤孝里14号
邮政编码 100031

*

新华书店经销 曙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1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81027-229-2 D 158 定价:6.5元

EG18/08
微观党史研究丛书
编委会

主 编：张希贤、王宪明、徐 兵
编 委：张希贤、王宪明、徐 兵
张伟良、张 勇、杨 虎
张志明、浮新才、李有林
魏怡恒、高永杰、田继贤

前 言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13 年的岁月，他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完善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运用了高超的领导艺术，指导了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的抗日斗争，正确地处理了同国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他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和策略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当抗日战争结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兴起的时候，他又在陕北，沉着坚定地指挥了一场反对国民党蒋家王朝的革命战争。他领导的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发挥出无法估量的作用。追根溯源，我国现时意识形态领域里，有很多东西，成形于延安时期。而毛泽东在延安，又与哲学、历史学、文化教育、广播宣传、报刊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毛泽东在陕北和延安的全部活动及其成就，一本 20 万字的小册子，是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的。本着精选的原则，我们清华五位师兄弟，几经商榷，决定选择人们谈论的热点和鲜为人知的史事做为突破口。本书所叙述的，毛泽东的五次理论攻势；中央领导核心的调整；开延安社会新风气；办报与抓文艺；对外交往（包括国外和大后方）和“毛泽东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问题等，是我们于是书中所立论的主题。

本书于写作过程中，多次请教我的导师清华大学杨树先教授、中央党校王渔教授、朱乔森教授和王荣先教授。在此，谨

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是书第四部分——《缔造一个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陈广侠提供的成稿，于此，也向陈广侠小姐表示真诚的谢意。

我们同学五人，自知才疏力薄，功底肤浅，故于是书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肯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当不胜感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第一手、第二手材料。我们于书后列了我们的主要参考文献。因本书属于一本通俗性读物，故在我们的引文中，仅用了引号，并未作注。在此，也向引文的作者们作一解释，并请求谅解。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们仅以此拙作，作为我们的微薄礼物，表示我们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本书作者之一：张希贤
1992年9月23日
写于清华大学三教

目 录

一、理论研究领域里的五次攻势	(1)
1. 党的理论基石	(6)
2. “这场仗得按我的方针打”	(9)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4)
4. “过去的事情得有一个结论”	(19)
5. “从4万到80万,不是一个小问题”	(23)
二、中央领导核心的调整	(35)
6. 问题的由来	(36)
7. 渐进的调整	(40)
8. 核心的形成	(50)
9. 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 凯丰的调整与安排	(56)
10. 对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的任用 和对张国焘的处理	(74)
三、开延安社会新风气	(82)
11. 这里办起了特区	(84)
12. 特区的特殊政策之一	(93)
13. 古为今用——屯田	(98)
14. 开发民智	(114)
15. 一代风范	(124)
四、缔造一个宣传者、组织者、鼓动者	(136)
16. 发轫于困境之中	(137)
17. 不适应就得改革	(140)

18. 漂亮的四步棋	(147)
五、培养一支生力军	(156)
19. 初始阶段,毛泽东指导延安文艺 的两个特点	(157)
20.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169)
21. 丰硕的果实	(178)
六、与美国人打交道	(187)
22. 最初的来访者	(189)
23. 三位美国女性	(200)
24. 挡不住的诱惑	(219)
25. 失去了的机会	(230)
26. 美国人看毛泽东	(242)
七、肝胆相照情谊深	(250)
27. 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国内记者	(253)
28. “互不相让的争论”	(261)
29. “中国的救星是毛泽东”	(271)
30. “杖策延安如昨梦”	(284)
八、从“毛泽东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演变	(296)
31. 要沉船的时候认识了毛泽东	(297)
32. 民众的呼声是一个“预兆”	(300)
33. 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的 是敌对方面的一位文人	(305)
34. 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 是有一定原由的	(309)
35. 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解释	(313)
附:主要参考文献	(316)

毛泽东，1937年1月13日，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47年3月18日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这中间，历时10年两个月又5天。

10年的延安岁月，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谈起，都是灿烂的、辉煌的。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在这十个寒暑中所获得的成就，当首推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贡献。

同任何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一样，毛泽东的理论建树，也呈现出它所特有的时代特色。

毛泽东在延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是通过在理论研究领域发动五次强大的攻势来完成的。

毛泽东的五次攻势，宏观上可以这样粗略地概括：

1. 为着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为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武装全党，为着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哲学的锐利武器去清除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从1936年夏到1937年夏，毛泽东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作，并亲自向党的干部逐章逐节地讲授自己的哲学著作。

2. 为着实现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为着清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为着向全党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地位，为着向全国人民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为着阐明抗日战争的正确发展道路，从1936年秋到1938年冬，毛泽东倾极大精力去研究中国的军事学、战争学，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学，并通过讲演、著书、开会、电报、指示、报刊杂志等媒介来宣传自己的学说。

3. 为着完善自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学说，为了向全国人民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的见解，为了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了阐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1938年冬到1940年春，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并通过编写教材，著书，报告，刊物发表来系统宣传自己的理论见解。

4. 为了给党的过去的历史作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解释，为了给党过去历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个公正的结论，为了清算党的历史中曾经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尤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从1941年到1945年春，毛泽东带头并且领导党的高级干部系统而深刻地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编著历史文献，研究历史文献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为着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为着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现象，为着解决抗战开始后伴随党的队伍飞速壮大而党内存在着的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问题，从1941年春到1943年夏，毛泽东集中力量，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调查研究党内存在的现实问题，主持编纂学习文件，指导全党开展一场空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以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从而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五次理论攻势，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依据客观实际提出的问题，认真地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书籍、有关中外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籍，通过阅读，冷静地思考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依据客观实际提出的问题，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他在延安的调查研究，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的：（1）对国际国内战争问题，通过大量的电报往还和大量的报刊通讯来收集材料；（2）对党内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研究来了解；（3）对党的历史问题，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自己的渊博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把所要解决的问题落实在自己的著述上。有些需要全党来解决的问题，他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全党系统地、深刻地学习革命理论、历史文献和现时文件，有针对性地解决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延安时期以前，毛泽东读过的书，基本上可分为五类：

(1) 儒家经典。少年时代，毛泽东读过近6年的私塾，所学多为“四书”、“五经”，故毛泽东的启蒙之学，为儒家经书。

(2) 介绍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著作。毛泽东开始读书的时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有一个较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毛泽东文化程度的提高和视野的逐渐开阔，他先后读了《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世界英杰传》、《民报》、《天演论》、《物种起源》、《民约论》等大量书籍和报刊杂志。当然，毛泽东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绝大部分是经过中国人加工、宣传的资产阶级文化。

(3) 中国古典文艺作品。毛泽东于学生时代，曾反复阅读《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书，就是在以后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他仍抽空阅读，用他的观点，思考书中的深刻哲理。

(4) 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1920年以后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和普及，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毛泽东读的马恩列斯原著就越来越多了。

(5) “无字之书”。毛泽东向来提倡向社会学习，提倡调查研究。从学生时代，到江西时期，毛泽东的一部分重要知识，是从社会调查中得来的。

毛泽东学历不高，但他勤奋，为学功底很厚。一般人投身事业之后，读书的劲头就锐减了，可毛泽东投身革命后，仍孜孜不倦，这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超过了他同时代投身革命生涯的同辈。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到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同时，中国共产党在15年多的奋斗中，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

富的经验和教训。就中国人民来说，从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00年的发展，其曲折、其艰辛、其波澜、其壮阔，也把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提到了历史的日程。诚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历史人物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1937年1月，毛泽东随党中央进入延安。此时的中国革命形势，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时。相对和平与安静的环境，促使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开始了艰辛的理论著述活动。

1. 党的理论基石

毛泽东在延安，发起的第一个理论研究攻势是学哲学，讲哲学，撰写哲学著作。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两次理论总结使他发现，对哲学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他，还是全党，都是相对弱的。而哲学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来说，又是攸关重要的。党内的几次“左”、右倾错误，其根源就在于党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精髓，运用当中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又没有从世界观的高度去解决问题，致使错误一再发生。为解决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问题，为清算党内教条主义，毛泽东发奋研究哲学，从事哲学著述，以教育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武装全党。

1937年初，延安还没有出版书刊的能力，毛泽东见手头和延安现有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根本不够用，于是建议中央多拨一些经费，从西安、上海、南京等地购买图书，以抵延安缺书之不足。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延安解放社和其它出版社、新华书店、图书馆等，以经营

延安的图书事业。上年（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两人，嘱其“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至三百元”，请叶剑英经手选择，刘鼎经手购买。“在11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按照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中国共产党立足延安后，把从江西苏区带来的书，从各城市买来的书，从各地新进的书，统收中央图书馆管理，图书种类和册数在不断扩大。

毛泽东于延安的图书中，认真研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特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职工会、时局及托洛斯基、布哈林之错误》、《怎么办？》、《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判》、《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研读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等10几种经典论著。除了研读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之外，毛泽东还阅读了：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大众哲学》；苏联米丁著、沈思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张如心著的《哲学概论》；费尔巴哈等著、柳若水译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布哈林著、刘伯英

译的《历史唯物论》；李石岑、郭大力合译的《朗格唯物论史》；故托里雅若夫著、任白戈译的《机械批判论》，严群著的《亚里斯多德之伦理思想》；日本河上肇著、李达等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等10几种中外学者的哲学著作。初步统计，毛泽东在延安，为准备《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有据可查的阅读著作是24种，精读5种。无据可查的无从可考，但推论，当不止此24种。

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集中精力攻哲学。其实，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渡河东征回师以后，毛泽东就开始把理论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哲学了。是时，毛泽东在他总结研究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过程中，牵涉了不少重要哲学问题。为把问题弄清楚起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原有的和新购进的哲学书籍。有一次斯诺夜访毛泽东于保安时，见有人带几本新哲学书来，毛泽东当下要求斯诺改期再谈，而花三、四夜功夫专心攻读那几本书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完稿和讲完后，毛泽东就全力来研究哲学了。毛泽东首先认真研读上述24本哲学著作，在著作上做横批、眉批、打勾、画杠、圈点、做注。有些书籍甚至读过10遍。其次，毛泽东在阅读批注这些哲学书籍的同时，认真思考这些著作中讲述的基本哲学原理，把基本问题搞清楚。第三，毛泽东在阅读的过程中，联系自己的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某几个领域给予充分的阐述和创造性的发挥。最后，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心得落实在著作上。

毛泽东把他所学的哲学著作，经过认真的思考、消化、研究、创造，写出讲稿，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然后组织学员讨论，以发现其中的问题。同时，每讲一次课

后，毛泽东都认真补充、完善一下授课提纲。如是多次讲授，毛泽东对哲学基本理论给予了深刻的理解和创造性的发挥。六、七、八三个月，毛泽东潜心补充完善讲授提纲，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实践论》、《矛盾论》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到1937年8月底，毛泽东基本上完成了研究哲学问题的第一个攻势。

毛泽东的第一次攻势，首先是他自己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使他的理论水平提高了不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其次，30年代末，他的哲学讲演，也教育了相当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第三，40年代，他的哲学讲稿印成单行本和他的政治地位在党内日益提高以后，他的哲学思想才真正培养了一代共产党人。

2. “这场仗得按我的方针打”

1936年秋到1938年冬，毛泽东在陕北发起了第二个理论研究攻势：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学。

毛泽东在陕北研究战争学和研究哲学几乎是同时开始的，甚至研究战争学比研究哲学更早些。1936年秋，为清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为着系统说明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毛泽东发奋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获得了初步成果后，毛泽东认为，哲学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问题，是解决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出现问题的根本钥匙，于是毛泽东于1937年春夏集中精力研究哲学。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了。围绕着如何与日本开战，打大仗与打小仗的问题，党内党外存在

着很大的分歧,故战争学问题提到了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为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为指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战争学,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学和中国人民如何进行抗战的战争学。

毛泽东研究战争学,阅读的东西不多,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另一部是孙武著的《孙子兵法》。其它参考文献有:列宁的著作:《社会主义与武争》、《第二国际的破产》、《共产主义》、《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各支部代表会议》、《关于立刻单独媾和并签订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论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俄国的失败与革命的危机》,斯大林的著作:《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论文:《反战反法西斯斗争的当前问题》、《法西斯主义——这就是战争》。

毛泽东研究战争学与研究哲学截然不同。他具有丰富的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深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军事路线的短处与危害,熟知国民党军队的战争打法与战略战术,加上他对中国社会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显而易见,他对战争学的研究要比对哲学的研究深入得多,主动得多。毛泽东反复阅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孙武的《孙子兵法》,从中吸取精华,细心琢磨、深刻体会用兵的奥妙。他过去读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和到延安新读的蔡东藩著的中国各朝历史通俗演义,在研究战争学时,得到了生动的运用。对书中以少胜多战例的研究,恰到好处地写进了他的战争学著作中。研究战争学,尤其是抗日战争学,